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 调查与研究

On The Survey and Research of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邱克威
(KHOO Kiak Uei)

摘要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研究起步较晚, 至今累计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其中陈晓锦的研究堪称是目前最系统全面的描写, 然而由于缺乏对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的基本掌握, 以及由此衍生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的正确认识, 导致研究结论上的不少偏颇。我们主张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应该重视结合所处的特殊社会结构进行综合考察, 而其研究的性质主要是接触变异, 尤其是不同方言间的相互影响; 具体采用的是结合汉语方言描写与社会语言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据此出发, 我们提出一套针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特殊性质的调查与研究的策略, 及其相应的工作开展规划。

关键词: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马来西亚华人、方言调查、马来西亚华语

Abstract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had a late start, and by far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is limited. To date, the studies done by Chen Xiaojin are considere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however, due to a lack of basic understanding in the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Malaysian communities, and the accompanying research approach and methodology, thereby deriving at erroneous conclusions. We propose that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should incorporate an analysis of the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ies where they exist, and that the basic nature of any language changes is one of interaction,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s. Hence the methodology should be a combined approach of language description and social linguistics. As such, we put forward a research strategy specific to the unique features of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and designed the working plan accordingly.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Chinese Malaysian, Dialect survey, Malaysian Mandarin

一、绪论

陈育崧（1972）曾提出方言帮群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特征”；而这一特征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基本保留早期移民方言帮群特征的社会结构，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至今区别于东南亚其他华人社群的最大特点；而滋生于如此社会环境下的华人语言特征也是比较突出的，同时也造就了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研究的特殊学科价值。（邱克威2012、2013a）于是，这必然要求我们在进行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方言研究时特别强调重视这方面的结合，即探讨任何语言现象的保存或变异都须置于其方言帮群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综合考察；如此才能真正作出符合客观事实的分析。

历来关于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的研究成果相当显著，但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绝少涉及方言的语言系统描写与分析。（参看詹缘端2015）目前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仅有陈晓锦（2003、2014）对马来西亚客方言、粤方言、潮州方言、闽南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系统的描写。此外，零星已发表的个案调查，如张屏生（2012）、林素卉（2015、2017）、杨迎楹（2015）、陈琪梅（2015）、邱克威（2017a）、郑秋盈（2017）

等。

陈晓锦近期的三大册《东南亚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概要》（2014）是其多年调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东南亚华人汉语方言研究的代表专著。至于研究方法，张双庆（2011）曾提出过若干意见，然而比较重要的仍是陈晓锦《论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2006）、《试论词汇研究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2013）二文总结其多年的工作心得，并且具体强调提出“词汇研究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中之重”（陈晓锦2013）。对此我们当然表示基本认同，只是其整体研究正是由于缺乏针对调查对象及调查地点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的综合考察，描写与分析难免显得平面化；甚至还出现一些结论上的偏颇。比如她提出马来西亚的“‘潮州话’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其中“并不具体区分潮州音、揭阳音或朝阳音等等”（陈晓锦2003：5），对此邱克威（2017a、2017b）给马来西亚原籍澄海与普宁的两个潮州次方言所进行的调查与研究，已经进行过分析辨证。

其实类似问题也不仅仅在方言的研究与描写上如此，詹缘端（2015）考察目前“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研究概况”时也总结：

华人方言帮群与地缘性社团会馆研究，一般只是按某种省籍方言人群为单位，通常假设方言帮群作为一个整体，很少深入分疏这些地缘性团体在方言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格局。

而具体到潮州方言群的研究，他也说：“全国各地潮人与雪隆潮人的族属一样，也不能简单视为讲潮语的单一帮群。”可见这是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研究中的普遍问题。按照洪惟仁（2016）对台湾闽南语研究工作的总结来说，即重视区别方言的“分类层次”。

于是我们主张，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应该结合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形成与发展，如此才能最终形成符合事实的客观描写，并且对其中的特殊变异形态及其变异机制进行合理的梳理与解释。

以下我们先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谈起，评述当前研究视角

与方法的问题；然后借由阐述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特殊性，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最后则提出一套适合于当下社会语言环境的研究规划及其开展方式。

二、当前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评述

自2014年开始，邱克威通过自己在乡镇地区华人方言的调查以及指导学生进行的调查，着重结合这些乡镇华人社区的形成及方言帮群的社会结构，与其方言系统的变异形态及其变异机制的描写，进行综合的研究与分析。目前为止累计的成果，除了上述提过的一些，还有林湘恬（2016）、林秀徽（2016）、马淑颐（2016）、李毓桓（2016）等。其中调查地域跨越东西马，以及西马南北各州，方言则包含潮州、闽南、福州等。此外，2016年8月份，由邱克威带领指导在霹雳州与槟城州交界的丹绒槟榔（Tanjung Piandang）与高渊港口（Sungai Udang）的方言调查工作，是马来西亚学术界历年来的第一支汉语方言调查团；组员主要为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组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学生。¹

这些调查与研究工作，相较于此前以陈晓锦为代表的调查在性质上有所区别。首先，不再以大方言群为笼统对象，而是区分其中次方言，甚至是细至原籍乡村单位的方言点。比如雪兰莪州丹绒士拔（Tanjung Sepat）的调查对象锁定为原籍澄海外砂乡的方言、高渊港口等地的调查则是原籍普宁北山村的方言；而这二者也都是代表当地最大方言帮群的方言。其次，重视地方社区形成历史以及方言帮群社会结构，尤其是不同方言群之间的接触。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视角，邱克威（2017a）对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特征如是总结：

马来西亚的各种华语方言不仅保留原籍乡镇的方言特点，而且经过长时间不同语言及方言的接触，还增添了各种复杂的变异形态，由此形成非常特殊的方言变体。

这种立足于原籍乡镇方言点的比较，同时着眼于特殊方言帮群社会结构下的接触变异，才能真正提取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实质，并对其进行全面而客观的描写分析。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主张的研究视角其实与洪惟仁（2016）基于台湾汉语方言的特殊性所提出的“社会地理方言学”是相通的。其云：

台湾的“新方言”都是方言接触的产物。其实就整个闽南语区而言，台湾闽南语都是新方言，台湾闽南语是漳、泉方言的混杂，没有所谓“纯泉腔”或“纯漳腔”的方言。但每一个地区混杂的配方不同，保守和前进的程度不同，因而产生各种大同小异的方言。如果我们排除了方言接触，台湾的闽南语将无法分类。语言接触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站在“社会地理方言学”的立场，台湾闽南语将不知怎么分类。

我们也主张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性质主要就是接触变异，而其中的复杂性就是由于不同地域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形成“配方不同”的变异类型，即所谓的“新方言”。

所以，相较于此前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之偏重于词汇，尤其方言中的外语借词（如孔远志1986、2000；陈晓锦2013），其实不同方言间的相互接触影响，特别是相互接触下产生的语音系统的变异才更应该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实则无论是语音或者词汇，这种不同方言间的影响绝对远甚于外语对个别方言的影响，首先是由于不同方言群间的接触肯定远比外语族群深且广，其次方言间语言系统的近似更易于产生互借与替代。这种方言间的接触变异，本身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特殊社会结构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也正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之具有特殊学科价值的地方。

其实这种不同方言群间的互动影响，也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课题的学者都清楚认识的，比如著名社会学家李亦园（1985：III）很早就曾明确指出：

在中国国土内，有各种不同方言群的人聚集而居的例子是不容易

找到的，只有在海外的地区中可以找到典型的例子，这是华侨社会的研究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裨益之处。

可惜的是，目前为止唯一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进行过完整语言系统描写的陈晓锦（2008、2014），其研究成果并未丝毫体现出这一特殊性，也未真正体现出上文提过的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变异特征。实则忽略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的特殊社会结构，绝非仅仅是无法提取方言变异的实质特征而已——这一点邱克威（2017a、2017b）根据马来西亚澄海话与普宁话的调查已进行过论述，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上的误区所导致的偏差。

我们举陈晓锦（2014：85-122）对于马来西亚纳闽（Labuan）福建话的音系调查分析为例。她将调查整理的语音系统与中古音系和厦门音系进行比较。这是她在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音系分析上所进行的统一处理方式，即先进行中古音系的对照，再继之以大方言类的代表城区音系的比较。这里其实就牵涉到研究方法上的几个问题。

首先，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主要是近一百余年由闽粤省份各原籍乡镇携带南来，而经由特殊语言环境的相互接触下产生特殊变异；其基础音系的源头就是原籍乡镇方言点的语音系统。这里其实丝毫未牵涉及中古音系的演变，即我们不可能认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在这一百余年的变异与中古音系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应该将其变异的源头上推至中古音系，所以相应的研究方法也未直接涉及中古演变规律的对比。这也就是说，既然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发展变异只是这一百余年由原籍乡镇南来后产生的，而与中古音系并无直接关联，那么比较对象理应是其原籍乡镇的语音系统。其次，马来西亚方言群由闽粤各乡镇地区南迁，带来的都是各自原籍乡镇、乃至村庄的家乡话，绝不可能是各方言或次方言的城区代表方言。比如这里统称为“福建人”的原籍闽南地区方言群，其实内部方言分歧是很明显的，即安溪人带来安溪话、永春人带来永春话，甚至于永春各乡镇来的人都携带的是各自略有差异的乡镇话，而不可能都是永春城区话。邱克威（2017a）调查的丹绒士拔澄海外砂话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即其音系特征

明显继承了外砂话，而与广东澄海地区其余次方言，包括澄海城区方言是有所区别的。这本应在情理之中，如永春或安溪南来先民们不可能都统一带来泉州城区话，更不可能带来的是闽南代表方言的厦门城区话，而是原原本本携带着自己最自然的原乡镇话家乡口音过番南来。因此马来西亚纳闽福建话与厦门话是否具备合理的比较基础，这样的比较方法是否成立，是需要严谨论证的。而事实也证明，纳闽福建人并非原籍厦门城区，其福建话的源头更非厦门城区方言，所以这样的比较方法就无法成立。于是如此比较下的差异其实并非纳闽福建话南来后产生的特殊变异，而更多是比较方言之间的方言点差异。

正是由于上述两点问题，我们看到陈晓锦（2008、2014）在比较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中古演变规律时，结论都是与原籍方言是几乎完全一致的，比如纳闽福建话（陈晓锦2014：85-110）就是如此；然而在纳闽福建话与厦门话的比较中就表现出不少差异。

我们以具体例子来说明。陈晓锦（2014：111-122）针对纳闽福建话与厦门话比较的韵母与声调部分就提出好几点相互间的差异。其实，纳闽的福建人主要来自永春与安溪；但由于陈晓锦（2014）并未交待其调查对象的原籍乡镇，因此无法落实究属何者。无论如何，这已足以让我们理清某些问题。比如陈晓锦（2014：111）在比较韵母差异时提出：“单元音韵母纳闽福建话比厦门话多了ə、ɿ”，并举例“皮p'ə⁴⁴、飞pə⁴⁴、糜mə²⁴、妹mə²²”。其实这正是厦门话与永春、安溪话的韵母区别，即厦门话“皮p'e”、永春和安溪话读作“皮p'ə”。（谭邦君等1996：35；林连通、陈章太1989：24）

其实陈晓锦（2014）进行的纳闽福建话与厦门话差异中最突出的是声调系统。实际上闽方言各地次方言语音系统的乡镇差异中表现最突出的正是声调系统，甚至于一个方言片下几个村庄之间的声调系统也会有差异。因此我们就看到陈晓锦提到：“纳闽福建话不但7个调的调值与厦门话有出入，且古调类今读的演变也有差异。”她提到的“古调类今读”的差异是指上去二声的归并分合上，即：（陈晓锦2014：113-114）

福建厦门话阳上、阳去调不分，古全浊上声归阳去，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和古全浊声母去声字今声调都是11“动=洞”，“是=示”。而纳闽福建话声调的归并情况显然与福建厦门话的“古全浊声母上声归阳去，与古浊声母去声字同读11”，及“古次浊声母上声字今白读并入阳去11，文读并入阴上53”，如：耳_采hi¹¹、耳_木n⁵³，不一样。

我们知道，永春话与安溪话虽同属闽南泉州次方言，但其声调系统差异较大，即虽然都属7个调类，但永春话全浊上归阳去、去声分阴阳，而安溪话上声分阴阳、去声合并一类。至于厦门话则一般认为漳泉混合，但其声调系统与永春话调类格局是相一致的。

我们从陈晓锦（2014：113-114）整理纳闽福建话与厦门话中的上声与去声归字比较的情况来看，似乎杂乱无章，毫无规律性，而她也未尝试进行解释。其实这里面牵涉到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上述提过的，其调查对象的原籍乡镇归属不清楚；其次，比较对象的厦门话本身就不是对等的声调系统，因此看不出其中变异的规律；再次，调查对象本身的声调系统极可能就是参杂了永春与安溪的混合系统，即洪惟仁（2016）所谓的“新方言”。因此，若能明确其调查对象的原籍乡镇，再按照永春与安溪两地声调归字的格局来参照比较，就能看出其声调与归字的变异情况，甚至于连其中的变异机制也都能理清。

如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洪惟仁（1995）在其台湾闽南语研究中，也同样指出不会以厦门音作为比较对象。其云：

我们在讨论台湾闽南语方言的形成时一直不曾提到厦门音，这是因为厦门方言和台湾方言属于旁系亲属关系，而非直系亲属关系。厦门和台湾虽然都是一样的“漳泉融合”，并且其形成的时间和台湾一样都是清代以来的事，不过两者是同时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台湾的闽南语没有发现直接传自厦门的方言。所以我们在讨论台湾闽南语方言的形成时，可以不必提及厦门方言。

这也就是我们上文总结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特点所一再强

调的，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研究必须着眼于方言帮群所属的原籍乡镇方言点，而不能笼统地以大方言分类来进行，即洪惟仁（2016）所谓重视方言的“分类层次”。否则如此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不仅结论粗糙，而且往往会陷入误区。

最后还有一点，正如洪惟仁（2016）提出各种不同接触模式产生出同一方言的“配方不同”的“新方言”，其实纳闽福建话在其特定方言帮群社会结构中经由接触变异产生的方言变体，仅仅是其特定语言环境下的产物，不能以之代表马来西亚福建话，更不能认为这是所有马来西亚福建话的变异模式。

上述不限定调查对象方言的分层、不限定调查对象方言的所在地域，是当下很多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共同问题，这绝不仅仅是陈晓锦的研究才出现的弊端。比如较早期孔远志（1986、2000）对马来西亚闽南语中马来语借词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其中不区分闽南话内部的“分类层次”，更不区分马来语借词的地域性差异。近年张屏生（2013）针对柔佛麻坡（Muar）南安话中马来语借词的调查整理所得，就比孔远志的词条多出一半左右；更重要的是陈琪梅（2015）调查得出吉兰丹巴西杜布（Pasir Tumboh）闽南话中的马来语借词303个，比张屏生的列表多出一倍以上，更是孔远志列表的近乎三倍。其实数量多少仍在其次，关键是张屏生与陈琪梅的研究很清楚地显示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中的外语借词研究也同样必须进行对象方言与调查地域的限定。

与此相关的，还有关于外语成分的语用性质问题，其中涉及材料性质的辨析，这也同样是当下多位研究者的共同问题。张双庆（2013）曾举吴文芯提出槟城福建话由于外语借词产生“福建话的语音变异”而新增添[tʃ]、[sk]、[kl]、[r]等辅音声母为例，指出：

吴文的处理办法的一个问题，会使一个方言中的外来语大量增加，把临时借用，或者是语码混杂的情况，都当作真正的借自外语的借词看待，把一些临时应用的词语看成为自己词汇一部分，这样做，必然导致一个语言中的外来语大量增加，音系复杂，这未必是该语言的事实，所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还得另想办法。

张双庆对待材料分析的审慎态度是非常正确的。²

陈晓锦（2013：93）在处理纳闽福建话时也提出类似的外语借词所产生的辅音声母变异，比如f-声母，其云：

纳闽福建话的声母与厦门话声母最大的差异就是多了一个在很多闽方言里都缺少的唇齿清擦音f，……而f-声母目前只出现在来自英语的外来借词中，如上所述，读这个声母的字不多，只有4个：……，但它的出现颇值得关注。

其实这个“唇齿清擦音f-”在其早期研究中就已多次提及，如《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陈晓锦2003：43-44）、《试论词汇研究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陈晓锦2013），甚至还有一篇专文讨论这一声母变异现象——《东南亚华人社区闽南方言的唇齿清擦音f声母》（陈晓锦2012）。

正如张双庆指出吴文芯论文中的问题，陈晓锦对于这个只出现于外语词中的f-声母的材料性质也并未进行严谨辨析。根据张双庆（2013）的意见，至少“应用频率极高”与“全社区的人一致应用”是承认该成分为借词的先决条件，但我们并未看见陈晓锦对这些成分应用上的任何调查分析。至如上述纳闽福建话中甚至还提及只出现于4个外语借词，那么对于这些成分究竟属于语码转换还是外语借词，确实是很有必要谨慎处理的；更何况是这里涉及到将借词问题延伸于语音系统的整理与描写。（参见邱克威2015）

此外，至于方言语法变异的研究部分，这当然是目前研究最薄弱的环节；只是综观陈晓锦（2003）对马来西亚三种汉语方言语法结构的分析，有些结论还是很值得商榷的。比如时间副词“刚”，以陈晓锦（2003：383、2014：1020-1022）对马来西亚潮州话与福建话的分析为例，其结论认为与原籍方言同样是[ŋam]、[ts ɿ̃a]等；实则本地各方言，包括福建话、潮州话等，这个虚词都基本已完全借用马来语的相应成分“baru”，比如“我刚来”说成“我balu来”。³这一点在孔远志（1986）、张屏生（2013）、陈琪梅（2015）等人的调查中都一再获得了

证实。然而在陈晓锦的研究结论中却丝毫未曾体现出来。

其实,针对陈晓锦调查分析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工作,已有前人提出过其中具体结论上的偏差,比如冼伟国(2010)就曾针对其吉隆坡粤方言的研究结论提出异议。上文指出不同方言间的相互接触影响下产生的特殊变异,才应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重中之重”,实则冼伟国的研究正可堪称是较早注意及马来西亚汉语各方言之间相互接触影响的学者之一。其《吉隆坡粤语之闽南语借词研究》(2008)应该是这一研究领域较早发表的系统研究成果。此外,林素卉(2015)的文章是其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其中也调查出新山潮州话音系受到福建话影响而产生的变异;无独有偶,杨迎楹(2015)对槟城闽南话上声受广东话影响而发生特殊变异的研究,也是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整理而成。另外,如邱克威带领的几个调查研究也都特别关注于这样的接触变异。(参看邱克威2017a、2017b、郑秋盈2017、林秀徽2016,等)

最后我们总结,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工作,虽然同属于汉语方言调查描写的学科领域,但由于其社会语言环境的特殊性,以及研究性质与目的的差异,就需要研究者采用具有较大针对性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由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主要是近一百余年由闽粤省份的各自原籍乡镇迁移南来,而在马来西亚特殊的语言环境下产生接触变异,因此传统使用中古演变规律的古今对照方式,其实并不具备直接针对性。在这里,直接与原籍乡镇方言点之间的对比分析,才能真正得出这些方言南来之后在特定语言环境下所产生的特殊变异。而这种原籍乡镇的比较必须是符合调查对象的方言系统来源,即调查对象及其原籍乡镇方言点的比较必须是直接对等,而不应笼统地以大方言分类的代表城区方言为比较对象。

此外,彻底地分析调查对象语言环境的情况,包括不同方言帮群混居与接触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当地社区用语情况等,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调查对象方言变异的原因及其变异机制。这就是我们上文所一再强调的,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必须结合华人方言帮群的特殊社会结构,尤其每个调查地点的社会历史与发展,才能真正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描写。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主张使用的是一种结合汉语方言描写与社会语言

学的综合研究方法。

三、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特殊性及其研究规划与开展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研究目前仍是亟待学界挖掘深耕的研究领域，正如邱克威（2017a）指出的：“这样丰富的方言生态由于近期华语的急速扩散，正在急剧消亡中，而本地的方言调查却始终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其文中更是疾呼：

考虑到马来西亚社会目前华语方言生态的急趋萎缩，伴随着这些丰富的语言信息也同时跟着消亡，这就更加突显出马来西亚华语方言调查记录与研究分析工作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基于上文所讨论的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主要特征及其相应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以及目前学科研究与方言生态的状态，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当下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做出一番具有针对性及整体性的规划。

在进行具体的研究规划之前，我们先得辨析明确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研究性质与研究目的。上文提过，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虽然同属于汉语方言研究领域，但又区别于传统的方言描写。简言之，传统方言调查描写工作的很大目的在于分析中古音类的分合演变，并根据这些演变规律划分方言类别。然而，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研究视角并不在于分析中古音类的演变规律，这已如上文所述；即使包含分类，如洪惟仁（2009）对台北闽南语的分类与分布研究，但其分类依据也绝非中古音类的分合演变。

我们上文已提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在南来一百余年的时段内，由于特殊语言环境的接触变异，形成各类型特殊的方言变体，即洪惟仁（2016）所谓“新方言”。我们调查与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描写这些特殊变异，并通过对其特殊社会结构的综合分析，探讨这些变异所产生的原因及其变异机制。因此，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使用的基本仍是传统方言

结构描写的调查方法，但在整理系统以及描写分析上则结合了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正如上文提过的，我们这种调查研究方法与洪惟仁（2016）所提出的“社会语言地理学”是相通的，其云：

方言自然演变、方言分化，以及方言变化速度的参差产生方言意涵性关系可以归入传统历史语言学、类型方言学的研究领域；但方言分化在地理上呈现的渐层变化及渐层分布与语言接触有关，属于社会语言学或语言社会学的研究的课题。把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方言渐层变化与渐层分布融合到语种分类系统，进一步作为语言地理区划的根据，这就是我把LAT定性为“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的理由。

当然，我们目前仍远远未有足够条件展开洪惟仁制定《台湾语言地图集》（LAT）的研究目标，毕竟那是他历经三十年工作积累的成果；而根据马来西亚多民族多语言的复杂社会结构，其所谓“地理上呈现的渐层变化及渐层分布”未必能呈现出整齐规律，乃至绘制完整的“方言地图”也未具备足够条件。实则马来西亚各地的方言接触变异都是依据当地多语多方言的特殊社会结构而各自独立发生的，相邻乡镇间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或有些许相互影响；但更多是这些华人聚居点的形成及分布情况复杂，各自并不一定沟通关连，也未构成完整的连续线，所以要在全国性范围内体现出一种具有“渐层变化”性质、而地理上又呈现出连续性“渐层分布”，并依此绘制出“方言地图”，其现实性仍需进一步严谨论证。

但无论如何，我们基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特殊性而制定的这样一种综合研究方法，确实与洪惟仁“社会语言地理学”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契合的地方。⁴

由此出发，我们先从调查研究的规划上讨论当下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如上文所述，当下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描写仍处于近乎空白的阶段。即使如陈晓锦所进行的调查，由于其对象方言未作合理分层、地域也未进行限定，因此仅可作为一种极笼统的概述。这样的调查工作对于往后的学科发展无法形成一种积累性的研究成果。这就如

邱克威(2013b)总结当下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四方面不足”时所指出的:

一是领域局限而未见全面开拓、二是零星论述而缺乏系统阐发、三是片面浅汲而不作穷尽深入、四是各自表述而较少交流汇集。因此学科发展未能形成积累性,十余年间难免“原地踏步”

学科研究要往前发展,成果的积累非常重要,因此在规划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描写的工作上,我们主张必须重视对象方言的合理分层,以及限定调查的地域。

这样的规划原则,当然也是立足于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特征而设定的。首先,马来西亚华人大方言分类如“潮州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其实夹杂着经济与行政等需要而定的,至于落实为各地社会群体划分,尤其在乡镇村落地区,则至少应细分至原籍的县市级单位,如“潮州”之下的“汕头”、“澄海”、“普宁”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应该细分至于县市以下的乡区。其次,这些南来方言在马来西亚特殊的语言环境下产生接触变异,而由于各地语言环境本就有差异,因此同一原籍乡镇方言到了不同地域也会因为不同接触环境而发生不同的变异,即洪惟仁(2016)所谓“配方不同”的“新方言”;这一点邱克威(2017b)针对霹雳州北部三个相邻渔村的原籍普宁北山话的比较研究中已作出清楚的阐释。

正是基于上述特殊因素,我们主张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描写工作首先就得在调查对象的方言及其所在地域上做出非常明确而严谨的限定。对此,我们仍可以参照洪惟仁(2016)所提的观点:

分类层次要恰到好处,类别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做为语言社会学或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繁杂、琐碎的个人语言必须经过“适当的”分类,细到什么层次要看研究的目的与需要。因此“建立语言分类的标准,确定语种的分类系统”是进行“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的前提。

所以说研究设定方言类别的“分类层次”不够谨慎，其研究结果肯定出现偏颇；如此看来，则陈晓锦（2003、2014）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研究则是在“研究的前提”上就出现了误差。

这一点“研究的前提”，确实是我们在规划与制定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策略时应该特别审慎对待的；尤其应该仔细考察调查地域的方言帮群社会结构。我们举例如邱克威（2017a、2017b）调查雪兰莪丹绒士拔村与霹靂州北部三个渔村的潮州话就是如此。首先，丹绒士拔的潮州人主要源自于澄海外砂乡，而根据林伦伦（1996）将澄海地区各次方言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外砂乡的基本特征都保存于丹绒士拔村，比如韵母系统中澄海城区话的[ie]组韵母、外砂话均读[iɔ]类，即外砂话“药”作[iɔ²]，而澄海城区作[ie²]。其中有意思的是，丹绒士拔村华人人口有半数为原籍福建诏安，但由于丹绒士拔村的特殊形成历史，潮州话成为当地社区的主要通行语，因此受到福建话的接触影响不大，但也还是有的；如邱克威（2017a）指出其中连读变调的特殊变异正是如此，其云：

本文总结丹绒士拔村外砂话阴入调二字连读变调的特殊变异是原籍外砂话迁移至丹绒士拔村后的语际接触产生的，而其接触影响的来源是村内诏安话与村外周边潮安话的双重影响。

此外，霹靂北部三个相邻渔村的普宁话也同样体现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变异与方言帮群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渔村的潮州人绝大多数都源自普宁的北山村，然而由于各自落户地点的语言环境差异，在“配方不同”的接触模式下产生不同类型的方言变体，即“新方言”。邱克威（2017b）仅从声调系统上比较，发现由于各自渔村方言帮群与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声调系统发生不同类型的特殊变异。比如阴平调的变异，瓜拉古楼（Kuala Kurau）社会由于原籍福建同安人占半数，其社区用语又是福建话与潮州话同时通行，而以福建话略强势，于是我们看到瓜拉古楼普宁话中的同安因素影响就较为显著，即其普宁话阴平调由原调值35变为同安话的33；至于其余二个渔村则由于大体为90%原籍普宁人，因此其阴平调值仍保持为35。

因此，限定方言分层与调查地域在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即洪惟仁（2016）认为这是“研究的前提”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比如上述丹絨士拔外砂话，若不进行合理的“分类层次”，而误以澄海城区话为比较，则其中的[iɔ]类韵母就都成了变异。

另外，尤其我们还看到，同一种方言在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变异形态，正是由于调查地域本身特殊的语言与经济等环境因素的差异造成的。因此，限定调查地域，并对当地的方言帮群社会结构以及当地的历史经济进行细致考察，与限定方言分层是同等关键的，也同属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研究的前提”。

上文我们通过实例的辨析，明确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的研究性质及其目的、和由此衍生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之后，接下来就是探讨如何具体落实研究计划的开展。

我们认为，考虑到现阶段的整体研究状态，以及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生态环境等因素，当前的研究任务是相当艰巨的。首先，近三十年来华人社会结构中方言帮群特征的淡化以及华语强势通行之后造成的汉语方言生态衰微，这正是邱克威（2017a）疾呼当下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工作之“迫切性与必要性”的主因。其次，研究积累的相对空白以及社会与行政资源的极度匮乏，这是当前研究规划与开展上首当其冲的最大障碍。

研究积累的空白已如上述，这就意味着研究规划基本是从零开始，其中包括方言系统描写材料的调查与收集，更包括各地华人乡镇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的资料整理⁵。因此我们在选取调查地域上必须特别谨慎。邱克威（2017a、2017b）的调查研究，加上2016年8月份带领指导的方言调查团，都集中于马来半岛西海岸沿线的潮州渔村。这是一个较好的对象选取与设定策略：一则对象方言相对一致，二则调查地域的社会条件也比较统一；如此可以形成内在具备统一基础的比较研究，而对外则可以延伸开去扩大调查比较的范围。

至于社会与行政资源的匮乏则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全国范围内的方言调查工作需要多方面物质与人事上的资源配合，但目前这方面的基本条件却很不足，这一点邱克威（2017a）文章中也已做过阐述；二是学界与

社会对于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性质及其重要性未有足够认识，造成学术及行政上的资源无法整合，包括学科发展需要的平台、学术成果发表与交流的平台等等。这是马来西亚整体学科学术发展的自身问题，也是高校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上的缺漏；当然其中更牵涉到“华人研究”学科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

无论如何，当下调查与研究的实际就是基本都是单打独斗的作业方式，而且个人的研究开展并未体现出整体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外国学者先且不论，本地研究者几乎所有的都是国外高校的在籍研究生，如上文提及的林素卉、杨迎楹等；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查地域基本都是大城市地区，如新山、槟城等。目前为止真正立足于本地而较有规划且持续性开展的方言调查工作，就是邱克威及其所指导的调查与研究，包括其学生论文写作与带队进行的方言调查。

总之，目前各方面条件都仍未成熟，调查资料的收集工作仍留下较多空白；但着眼于工作本身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即使“方言普查”的效果无法短期内达成，当下仍是必须以抢救式的姿态展开各地乡镇方言资料的调查与收集工作，而眼下定期组织方言“调查团”的研究规划则是最终迈向“方言普查”目标的绝佳途径。

四、余论

2012年“第三届海外汉语方言研讨会”，詹伯慧（2013）发表讲话，强调要“再接再厉，把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由此可见中国汉语方言学界对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视。近数十年来东南亚华人研究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也堪称蔚然大观，相比之下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的起步与发展算是相当滞后的。

上文提到“华人研究”学科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作为学界与社会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工作缺乏清楚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其实并不限于汉语方言的研究，而是整个“华人语言研究”——包括“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既有事实。

这一点，邱克威（2016）已做过阐述，尤其列举各种“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目录”以及各类“华人研究概述”等著作，其中都往往缺漏“语言研究”一类，他指出：“东南亚华人研究学科向来都未重视华人语言的研究。”至于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其云：（邱克威2016）

自从90年代末以来，华人语言研究逐渐引起注意。但这主要源自于汉语研究的学科领域内，而非由华人研究学界。……这些学者的研究，很多都是以汉语语言学研究为出发点而进行的海外华语描写与分析。其中大部分学者并未涉及其他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也未与海外华人研究团队主体进行交涉。这也部分解释了何以各种华人研究文献目录会如此多所缺漏。

这种“华人研究”与“华人语言研究”各自学科领域的隔离，甚至互不交涉，也可以部分解释陈晓锦（2003、2014）研究中出现误区的原因。即如上文所一再强调，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是必须置于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特点的视域下进行综合分析，才能真正理清当中的变异形态及其变异机制的。而所谓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的特点，正是需要“华人研究”学科的介入。

正是在引进马来西亚各地华人方言帮群社会结构因素的综合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变异形态竟是如此的复杂多样。这与洪惟仁（2016）考察台湾汉语方言在各种“配方不同”的接触变异后产生的各类型“新方言”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认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研究与台湾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但其中二者的差异我们上文也同样做过交代。无论如何，洪惟仁（2016）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扎实的理论基础，结合两种学科领域的研究理论与研究视角提出“社会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是很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然而基于二地社会及语言环境的差异，我们也许无法完整画出“方言地图”，但是这种方言地理分布图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如邱克威（2017b）对于霹雳北部普宁话声调变异类型的调查与比较，若是拓宽地域及于周边的普宁人聚居地，举例以阴平调变异为33与保存原调值35两种类型的分布绘制出“同

言线”，那不仅能理清方言变异的扩散趋势，或许还能从中看出方言帮群互动的模式。

实际上，绘制同言线的可能性及其适用域是极广的，比如北马槟城与吉打等地的闽南话受泰语影响，其货币的“角”单位称[puat]，许云樵（1961：44）认为其本字作“钹”，并很早就提到：“槟城人把古邦叫作“钹”（Bat），一角钱便说做一钹。”这种“钹”的分布地域其实也很可以绘制一个同言线。再如同样是北马某些地区流行的闽南语语气词[kok]，杨迎楹（2016）认为是马来语的后置副词lagi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同言线与上述“钹”的同言线甚至可以进行对比参照。还有，槟城由于政治经济因素，对北马各地的影响很大，包括语言的影响。比如槟城流行的闽南语为漳州腔，其区别于泉州腔的特征如“猪”、“鱼”等韵母作[u]，而泉州腔作[i]或[i]；然而由于特殊因素，北马如霹雳北部乃至于吉兰丹的原籍同安或南安人，其“猪”、“鱼”韵母也变成[u]。有趣的是，并非所有漳州话读[u]的遇撮合口三等字都随之变化，有些字仍保留为[i]或[i]，而且各地保存或变异的具体情况又有区别。这也很可以根据不同词汇韵母[u]或[i]/[i]而绘制一组的同言线。

相信这些成果积累起来，最终即使不能如洪惟仁（2016）完成的“方言地图集”，但必定也能给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变异的形态及其分布情况整理出一个较全面而客观的画面。

由此衍生开去，包括邱克威（2017a、2017b）对于马来西亚澄海与普宁二方言音系的调查描写，我们都明显看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变异模式往往超乎规律性，即王士元（2002）所说的“残留现象”——由于“在时间上相交的两个竞争的语音演变造成的”复杂音变模式。从语言变异的理论层面来看，王士元（2002）对于“规律性假设”如是理解：“一种语音演变如果没有其他的演变相互竞争，这种语音演变就是有规律的。”因此，考虑到马来西亚语言环境的复杂性，由于“多向度等势接触”（陈保亚2013）引起多方向演变规律之间的相互竞争，任何音变规律都有“可能因其他演变的竞争而半途停止”，并由此产生“残留现象”（王士元2002）。语言变异理论对这种复杂变异现象的解释，正如王士元（2002）

所总结的：

如果我们更多地从时间方面考虑的话，被方言地理学家观察到并且在社会语言学中研究语言运用所考察的很多“非结构体”就能更加符合这样一个必要的信念，即我们的语言行为是符合规则的。在评论生物进化的普遍原理时，Huxley指出，在共时描写中“我们使变化过程凝固在一幅不真实的静态画面上……只有在最长远的展望中……进化的全部过程才是可见的。”在我们现有的短期展望中，大量竞争性的相交演变是在为词汇中每个词的语音前途而竞争。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跨度，我们往往很难得知哪些演变是偶然发生的，哪些能够持续下去，哪些来自一千年前，哪些正在衰落，以及哪些刚刚进入这种语言。要了解这样复杂的动态情景，我们必须仔细分析，试着把各种交织在一起的因素逐一分离出来，这包括生理的、结构的、社会的以及其他的因素。从这里考察的因素来看，“规律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改，以便考虑那种在时间上相交的竞争性语音演变所造成的残留形式。

我们对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变异的调查，正是属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动态情景”的视角。于是我们很难假设其中能够体现出整齐一致的规律性。比如从林素卉（2015）、郑秋盈（2017）、邱克威（2017a、2017b）等研究中，我们都能清楚看出一些音系变异中的“词汇扩散”迹象，而上述“猪”、“鱼”韵母[u]、[i]/[ɿ]的各地变异模式也清楚看出是“词汇扩散”的结果；所以“词汇扩散”的理论与研究视角，对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各种复杂变异现象其实是很有解释力的。（参看王士元、沈钟伟2002）

这种“残留现象”现象，王士元从变异过程来看提出“词汇扩散”理论，若从音系变异的角度来看，即徐通锵（2008：389）提出的“叠置式音变”，其云：

“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则是不同系统的因素共处在一个系统之中，因而相互展开了竞争，如果其中某一个系统的因素在竞争中失败，退出交际的领域，那么在语言系统中就消除了叠置

的痕迹，实现了两种系统的结构要素的统一。我们把这种竞争的过程称为叠置式音变。

邱克威（2017b）正是以“叠置式音变”理论来解释瓜拉古楼与高渊港口普宁话的阳上调部分变异为21、而部分仍保留原调值13的现象。

此外，“词汇扩散”调查若投射于音系学或形态学上的表现，正如王士元（2002）说的：“它们给词汇的音系结构带来的影响必定比那种‘规律性假说’所设想的条理分明的世界要复杂得多。”我们还可以用这种复杂音变的理论模式，作为我们调查分析年龄分层间复杂的方言差异现象。邱克威曾经指导学生进行方言点内部年龄分层间的词汇掌握差异研究，比如郑美玉（2013）、叶碧玲（2013）、陈婉芬（2013）、叶慧婷（2016）等，这些研究都发现不同年龄分层间出现不同类型的词汇替代等变异形态；只是其中都未进行音系学上的整理，或者是将其应用于“词汇扩散”理论的分析。另如邱克威（2017a）发现丹绒士拔外砂话在其两个同龄层调查人间的发音特征差异，并指出：

本文认为这种差异不应简单看作个人发音特点，而应从丹绒士拔村外砂话变异的角进行审视。而其中变异的主因就是语际接触所造成的。我们通过这些细微差异的整理，甚至可以看出外砂话由原籍迁移至丹绒士拔村的多元语言环境后所必然经历特殊变异过程的一些端倪。

然而当具体进行不同年龄分层间的调查时却发现中年及以下发音人的方言语音异常混杂纷乱，文中甚至提出这些年龄层不适合于进行“纯粹字音调查与音系描写的做法”。实则若结合“词汇扩散”理论的调查分析，或许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结构是多元而复杂的，其中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变异及其分布更是加倍的复杂多样，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个巨大的挑战。正如吴小安（Wu 2010）在其摸索马来西亚槟城-吉打华人经济链条的发展历史线索时一样，面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变异形态的纷繁多变，我们

也相信唯有将所有各别的细点一个一个浮出水面，一旦“水落石出”，我们沿着石子指引的路径必能最终寻得一条出路。他说：

Considering the heterogene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t is believed that only after enough local and regional studies have been made can these synthesizing efforts really become effective.

(Wu 2010: 3)

[考虑到东南亚的多元性与割裂性，我们相信唯有具备足够的地点及区域的研究成果之后，它们的综合效用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才一再强调，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整体描写必须建立在各别方言点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调查与研究规划也着重从每一个方言点做起，且必须严谨限定方言分层与调查地域。而这些每一个方言点的方言变异，都是其特殊方言帮群社会结构下的必然产物。这正是我们从文章开头就不停重申的，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必须置于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社会结构特点的视域下进行综合分析。

注释

- 1 本次方言调查团，由邱克威带领并指导二组学生，分别为博特拉大学中文组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共约十人。这次的方言调查团，很幸运地获得Khind Starfish Foundation的Project for Happiness 2016分别拨款给二组学生，总数逾一万元马币的研究经费。
- 2 上述陈琪梅（2015）文章是整理自其学士学位论文，文中仅列出词表及比较差异，然而其完整论文的主要部分实则是进行社会使用情况的调查，即为了明确吉兰丹巴西社布闽南语中外语借词的使用频率，确保其并非临时借用而是属于高频使用的常态表述方式，她的论文中的研究是结合了使用频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的。正如张双庆（2013）文中指出的：“笔者的建议是把这类应用频率极高，而且为全社区的人一致应用，只是语音上仍未经较大的改造的这些外来词定名为‘半外来语’，这些词可以保留它们原来语言一些音韵上的特点，而不和原来语言中的语音系统相混。这些特殊的词语，只在词汇部分处理，这样或者更能看出

当代海外汉语方言比较独特的面貌。”因此，陈琪梅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具有较大可信度的，而且其文中对于借词成分的处理也仍只限于“词汇部分”，而不涉及语音系统。

- 3 “baru”为马来语中相应于汉语范围副词“也”的成分，马来西亚各方言中基本都已由马来语所替代；由于闽粤等方言中均转读为舌尖边音的“balu”。
- 4 如果考虑到台湾汉语方言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语言环境都同样是多方言杂处而相互影响下产生的接触变异，那么由此衍生出来的研究方法自然有许多相通的地方，那么就能明白何以我们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量身定制的调查与研究方法能与洪惟仁所提出的“社会语言地理学”相契合。当然，考虑到两地社会历史及其社会结构仍是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其“社会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
- 5 马来西亚各地华人乡镇历史资料与历史叙述的空白，这在我们多番的调查工作中体会尤深。比如近期由华社研究中心完成并已结案出版的《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詹缘端等2016），就是清楚诠释了克服这种“空白状态”完成研究工作的绝佳范例。因此，权威潮学研究专家黄挺教授的审查报告如是说：“这3年里，我作为研究计划的咨询专家，了解负责实施计划的研究团队，如何在几乎空白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十分努力的田野工作，搜集文献，采访调查，终于积累起颇为厚实的资料，完成这项研究的整个过程。”（詹缘端等2016：III）

参考文献

- 陈保亚2012。《马来西亚多语现象：一种独特的接触类型》。《当代评论》第3期，页61-69。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 陈琪梅2015。《吉兰丹（巴西杜布）闽南语中的马来语借词研究》。《学文》第5期，页135-151。吉隆坡：学文社。
- 陈婉芬2013。《诗巫福州闽清人的方言掌握能力与语用情况》。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 陈晓锦2003。《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 _____2006。《论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语文研究》第3期，页55-59。山西：山西社会科学院。
- _____2012。《东南亚华人社区闽南方言的唇齿清擦音f声母》。《暨南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第5期，页104-108。广州：暨南大学。
- _____2013。《试论词汇研究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北方语言论丛》第3辑，页7-19。宁夏：阳光出版社。
- _____2014。《东南亚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概要》。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陈育崧1972。《华人社会的结构与形态》。载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

- 录》，页3-29。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洪惟仁1995。《漳泉方言在台湾的融合》。《国语文教育通讯》第11期，页84-98。台湾：国立台南师范学院。
- ____ 2009。《台北地区闽南语的方言类型与方言分区》。《台湾语文研究》第3卷，页239-309。台北：台湾语文学会。
- ____ 2016。《台湾的社会地理语言学及其理论》。《台湾语文研究》第11卷第1期，页115-168。台北：台湾语文学会。
- 孔远志1986。《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闽南方言借词看闽南华侨与印尼马来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页19-30。北京：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 ____ 2000。《中华、马来文化交流的又一历史见证——汉语中的马来语借词》。载孔远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页355-366。香港：南岛出版社。
- 李亦园1985。《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西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湾：正中书局。
- 李毓桓2016。《霹雳州丹絨檳榔普宁话的音系调查》。未刊稿。
- 林连通、陈章太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林伦伦1996。《澄海方言研究》。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
- 林素卉2015。《语言同化与转移——以新山地区老、中、青三代移民的潮州方言为例》。载庄华兴等主编《变迁中的马来西亚华人与社会（人文与文学卷）》，页159-188。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____ 2017。《马来西亚新山地区闽南语词汇比较研究》。载廖文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页233-250。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
- 林湘恬2016。《瓜拉古楼闽南方言（同安话）语音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 林秀徽2016。《诗巫宋溪美禄村福州方言（古田话）语音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 马淑颐2016。《雪兰莪巴生和柔佛麻坡福建永春方言的语音和词汇比较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 邱克威2012。《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7期，页63-78。南京：南京大学。
- ____ 2013a。《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页1-24。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____ 2013b。〈前言〉。《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页I-III。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____ 2015。《书面性与音变性为二重标准的“华语词”界定——兼谈马来西亚〈现代华语词典〉修订工作的收词标准》。《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109期，页

1-9。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____ 2016。《一百四十年来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史概述》。未刊稿。

____ 2017a。《雪兰莪丹絨士拔潮州方言（澄海话）音系调查分析》。载廖文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页199-217。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

____ 2017b。《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声调变异及其社会因素的调查研究——以霹靂州北部三个相邻渔村的普宁话为个案分析》。《海外华文教育》第2期，页258-267。厦门：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谭邦君等1996。《厦门方言志》。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王士元2002。石锋、廖荣蓉译。《竞争性演变是残留的原因》。载王士元《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页88-115。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士元、沈钟伟2002。《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载王士元《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页116-146。北京：商务印书馆。

洗伟国2008。《吉隆坡粤语之闽南语借词研究》。《南方学院学报》第4期，页73-100。新山：南方学院。

____ 2010。《〈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之吉隆坡广东话阅读》。《新纪元元学报》第6期。吉隆坡：新纪元学院。

徐通锵2008。《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许云樵1961。《槟城彭亨的旧币制》，载许云樵《马来亚丛谈》，页44-47，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社。

杨迎楹2015。《槟城闽南语上声调调值初探——35还是33》。华社研究中心举办“2014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宣读论文。

____ 2016。《槟城福建话句末“kok”一词语义探析》。《学文》第10期。吉隆坡：学文社。

叶碧玲2013。《增江新村北区客家人的方言掌握情况调查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叶慧婷2016。《实兆远三条路古田方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詹伯慧2013。《再接再厉，把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在第三届海外汉语方言研讨会上的发言》。《北方语言论丛》第3辑，页1-6。宁夏：阳光出版社。

詹缘端2015。《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帮群研究概况——兼谈雪隆潮人研究的构想》。《学文》第8期，页19-29。吉隆坡：学文社。

詹缘端等2016。《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雪隆潮州会馆。

张屏生2013。《马来西亚闽南话和台湾闽南话的词汇比较》。《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页125-145。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张双庆2013。《研究海外汉语方言外来语的一些思考》。《北方语言论丛》第3辑，页55-63。宁夏：阳光出版社。
- 郑美玉2013。《芙蓉客家村的语用生态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 郑秋盈2017。《瓜拉古楼潮州方言（普宁话）与原籍普宁话的音系比较》。载廖文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页218-232。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
- Wu, Xiaolan 2010.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Singapore: NUS Press.